

應舉指南

——王樵《書帷別記》的內容要點 與撰著意義*

連文萍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提 要

王樵稟承家學，得第早發，《尚書日記》為治經心血結晶，但讀者反應內容龐雜，不利閱讀記憶，因此又著《書帷別記》。此書選列考題，指導辨識題目、闡釋義理、解讀字句，展示《尚書》命題趨向與應試技巧，但未建立更嚴謹的應考知識體系。而為應舉所需，指示守經遵註，又刪除罕見命題的篇章，透露出治經與應舉的兩難，雖能指導舉子熟玩經傳、發明先聖之言，引領舉業之正途，卻也難以擺脫為考試服務的窠臼。

關鍵詞：王樵 書帷別記 尚書 科舉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6-2410-H-031-061-MY2）相關研究成果，並承蒙兩位匿名評審指正，僅此致謝。

應舉指南

——王樵《書帷別記》的內容要點 與撰著意義

連文萍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明代科舉係由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與劉基（1311-1375）參酌唐、宋取士舊制所制訂，以《四書》、《五經》命題試士。^❶《五經》之中，舉子只須選考一經，謂之「本經」。許多科舉家族即專研本經，積累為家學，甚而牽動地方的士學，形成治經特色，如浙江餘姚舉子多治《禮記》，江西安福以治《春秋》知名，^❷學界稱之為「地域專經」。

江南地區科考最盛，^❸「地域專經」現象顯著，其中位屬江南的南直隸鎮江府

❶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卷70〈選舉志二〉，頁455。

❷ 餘姚專經研究，可參考（日）鶴城久章著，鍾瑩譯：〈明代餘姚的禮記學與王守仁——關於陽明學成立的一個背景〉，收於：《思想與文獻：日本學者宋明儒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56-367。有關安福專經研究，可參考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年）；陳時龍：〈明代科舉之地域專經：以江西安福縣的《春秋》經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5本第3分（2014年9月），頁359-426。

❸ 范金民：〈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布及特色分析〉，《南京大學學報》第2期（1997年2月），頁171，指出江南進士人數多、名次前、仕宦顯，成為明清最著名地域文人集團。丁蓉：

金壇縣，^④舉子多以《尚書》為本經，王篤堃統計明代金壇縣中式情形，即謂：「金壇縣以《尚書》中式的進士約佔總數 72%，以《尚書》中式的舉人約佔總數 77%」。^⑤該縣王氏家族傳承《尚書》家學，王樵（1521- 1599）應舉有成，所著《尚書日記》能發明經旨，劉起鈞綜論明代《尚書》論著，推許為「佳作」：「今日研讀《尚書》，有些問題亦往往因其說而獲貫通」。^⑥王樵又於《尚書日記》別出《書帷別記》，便利家族子弟及地方士人應舉誦讀，惟此書刊行約十年，即併入《尚書日記》重刊，二書的內容差異及分合原因，值得探討。

目前學界對王樵已有關注，如杭義梅《王樵及其《方麓集》研究》討論其生平及文集。王篤堃《王樵《尚書日記》研究》論述版本及內容特色。邱澎生〈有資世用或福祚子孫：晚明有關法律知識的兩種價值觀〉，論述王樵與其子王肯堂（1549-1613）的律學。^⑦《書帷別記》未有專論，陳恆嵩《禹貢、經筵、科舉：宋明《尚書》學新探》曾述及，列為明代講章類科舉用書之一。^⑧

以經學研究而言，《尚書日記》為王樵治經代表作，《書帷別記》既已併入，即失去獨立存在的價值。但就科舉學研究而言，《書帷別記》出自家學深厚、科

《明代南直隸舉人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44，統計：「明代進士共24862人，南直隸進士3892人，占總數的15.65%，在明代十五大政區中進士人數居首位」。

④ 據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頁377，「南直」條：「明成祖從南京應天府遷都北京後，以舊時江南省所轄各府直隸南京，時稱南直隸，約有今江蘇、安徽兩省地。」丁蓉：《明代南直隸舉人考》，頁15，「南直隸的轄域範圍在明代幾經變更，至明中期後，轄域範圍較穩定，共轄14府、4直隸州、96縣」。按，金壇縣在明代屬南直隸鎮江府，今屬江蘇常州。

⑤ 王篤堃：〈科舉、家族與著述：明代南直隸金壇縣《尚書》專經研究〉，《教育與考試》第1期（2020年1月），頁35。

⑥ 劉起鈞：《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307。

⑦ 杭義梅：《王樵及其《方麓集》研究》（揚州：揚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5年）。王篤堃：《王樵《尚書日記》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7年）。邱澎生：〈有資世用或福祚子孫：晚明有關法律知識的兩種價值觀〉，《清華學報》第33卷第1期（2003年6月），頁1-43，後收於：《當法律遇上經濟：明清中國的商業法律》（臺北：五南出版公司，2008年）。

⑧ 陳恆嵩：《禹貢、經筵、科舉：宋明《尚書》學新探》（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8年），第7章〈明代科舉《尚書》學〉，頁235。

名有成的經學名家之手，非一般坊刻可比，能呈現其治經應舉的權衡與擘畫，亦可窺知萬曆時期《尚書》本經的科考概況，值得細加考察。本論文即以此為研究角度，探討方向有三：一為《書帷別記》撰著背景與用意，探看學力的養成、家學的傳承。一為內容要點，以見對《尚書》命題的摘列、答題技巧的指導。一為義理闡說，以見經學家說經應舉的立場與方法。最後綜述是書與《尚書日記》的刊刻分合，以及對後世的意義。

二、科名家學與撰刊背景

王樵，字明逸，號方麓，家族以《尚書》為應舉本經，其父王臬（1477-1553）於正德十二年（1517）中進士，⁹王樵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進士，其子王肯堂於萬曆十七年（1589）中進士，成就「金壇父子進士相繼三代，前此未有」之榮。¹⁰而王肯堂尤為秀出，參與館選，獲為館元，得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接受朝廷培育，¹¹難得的殊遇，使家聲愈顯。

王樵歷官行人、刑部員外郎、山東僉事、浙江僉事、尚寶司少卿、南京太僕少卿等。在官場嚴於持身，不喜迎逢，王錫爵（1534-1610）謂：「余往在朝行中，望見王公，鈍口樸貌，其行粥粥如也，其息深深如也」，並惋惜未獲大用：「惜公位登三事，而散處閒局者十三；入仕五十年，而退居山野者十七」。¹²仕宦之外，王樵深研經學、著作等身，湯顯祖（1550-1617）嘗謂：「蓋予未仕時，即

⁹ 王臬，字汝陳，號遲庵，生平見（清）孫汝謀等修：《鎮江府志》（東京：內閣文庫藏康熙十四年序刊本），卷36〈王臬〉，頁28-29。

¹⁰ （明）王樵：《方麓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卷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293。

¹¹ 王肯堂科名概況，可參考筆者：〈一甲不預，則望館選——王肯堂的科名與萬曆科舉世風〉，《成大中文學報》第58期（2017年9月），頁59-100。

¹² （明）王樵：《方麓居士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刊崇禎乙亥補刊墓志銘本），卷前，王錫爵：〈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恭簡方麓王公墓志銘〉，頁6。

知東南江海之上，明經術、守先王之道者，方麓王先生一人而已」。¹³ 焦竑（1541-1620）亦謂：「明興，雍熙龐碩之化垂三百年，士大夫通經學古者項背望於朝，而莫盛於方麓王公」，¹⁴ 二文雖不無溢美，然觀所撰《尚書日記》、《書帷別記》、《周易私錄》、《周官私錄》、《春秋輯傳》、《四書紹聞編》、《老子解》、《讀律私箋》，涵蓋諸經、子書與律學，實乃儒者，故身後寫入《明史》，獲評：「恬澹誠慤，溫然長者。邃經學，《易》、《書》、《春秋》皆有纂述」。¹⁵

諸書之中，《尚書日記》為治經代表作，《書帷別記》與之一脈相承。據于明照〈尚書日記敘〉謂：

大鴻臚方麓王公，挺命世之姿，寄思深湛，潛心閭域，究極淵奧。既以占《尚書》起家，又其世業也，乃益研精是經，勒成茲帙。……公昔致山東政歸，而草本落成，家塾業已刊布矣。既再召留都，清曹多暇，芟煩舉要，遂為定本，顧未有善刻也。余家自曾大父契玄公始業是經，著《中說》若干卷，以授大父素齋公，二公則公之外祖父也。講磨秘旨，淵源殆有自焉。思以公之學廣之四方，且以明吾壇經學之傳也，乃捐貲命諸刷人。¹⁶

此文記錄《尚書日記》撰刊時間：一為「致山東政歸」，該書草本落成，由家塾初刊，據其〈行狀〉，乃嘉靖四十年（1561），於山東按察僉事任上謝病歸。一為「再召留都」，為萬曆三年（1575）出任尚寶司少卿，及其後南京鴻臚寺卿任

¹³ （明）湯顯祖：《湯顯祖集》（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卷28〈壽方麓王老先生七十序〉，頁996。

¹⁴ （明）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33〈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頁541。

¹⁵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221〈王樵〉，頁1569。

¹⁶ 于明照：〈尚書日記敘〉，收於（明）王樵：《尚書日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十年金壇于明照刊本），卷前，頁4。按，引文中「二公」疑有訛衍。

內，¹⁷此類官職素為恩蔭，故謂「清曹多暇」，王樵將是書修為定本，但未有善刻。上述時間點，正是前引王錫爵〈墓志銘〉所謂「退居山野」與「散處閒局」，透露出王樵入仕、退居皆不荒廢治經，故能持續增修撰著。

文中強調王樵家學淵源，除了王氏世業，亦與于氏有關。此為王樵母親于氏家族，「契玄」即于鑑，始治《尚書》，成化十年（1474）中舉人，「素齋」為于湛（1480-1555），正德六年（1511）中進士，¹⁸二人為王樵的外曾大父及大父。于明照與王樵同輩，亦治《尚書》，得中萬曆四年（1570）舉人，其女嫁給王肯堂，翁婿曾結伴赴考。其堂弟于文熙、于孔兼於萬曆八年（1580）同時中進士，其子于玉立則於萬曆十一年（1583）中進士，¹⁹家族功名鼎盛，故其以「天其盈我乎？盈則溢，吾其以謙承之」，²⁰引例乞恩，獲授南京都察院都事，闢園閒居。而王樵於二十六歲中進士，屬於早發，²¹復有撰述，顯示治經應舉的實力，被視為傳承王、于二氏家學，乃金壇治《尚書》代表人物，故于明照「以公之學廣之四方，且以明吾壇經學之傳」，於萬曆十年（1582）刊行《尚書日記》的「定本」。

《書帷別記》與《尚書日記》撰刊的關係，王肯堂在《尚書日記》書前的〈識

¹⁷（明）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卷33〈王公行狀〉，頁544-545。又見（明）王樵：《方麓集》，卷7〈樵李記〉，頁238，「嘉靖辛酉，予自山東謝病歸，凡十有三載。」卷7〈符臺記〉，頁242，「萬曆乙亥，自浙西召為尚寶少卿。」

¹⁸（清）黃之雋等纂：《江南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卷163〈人物志·儒林一〉有〈于鑑〉、〈于湛〉傳。

¹⁹于明照，字元晉，號見素，生平見（明）馮夢禎：《快雪堂集》（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黃汝亨刻本），卷9〈于長公傳〉，頁172-173。于文熙見（清）郭毓秀等修：《金壇縣志》（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康熙二十年序刊本），卷9〈選舉志〉，頁12。于孔兼見（清）張廷玉等纂：《明史》，卷231〈于孔兼〉，頁1632-1633。于玉立見前書，卷236〈于玉立〉，頁1664。關於于氏家族，吳婷芳：《金壇于氏家族文化研究》（安慶：安慶師範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3年）有家族成員科名著述表列，惟部分內容仍可精確，如頁8，謂于明照著「《尚書日記》16卷（存）」，有誤。

²⁰語出（明）馮夢禎：《快雪堂集》，卷9〈于長公傳〉，頁173。

²¹不著撰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登科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年，《明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影印本），〈第三甲〉，頁35，「年二十二，九月二十六日」。按，此為應舉時上報的「官年」，實歲為二十六歲。明代士人虛報年齡應舉的現象，可參考陳長文：〈明代科舉中的官年現象〉，《史學月刊》第11期（2006年11月），頁44-48。

語〉謂：

初，山東乞休歸，著《尚書日記》，旋著《書帷別記》，家貧不能付剞劂。從兄爾祝以《日記》活字版行之，窮經家競相購致，苦流通未廣，余外舅于見素公刻于家塾。《別記》則余姪德威刻之。²²

可見《書帷別記》緊接《尚書日記》撰寫，時間亦在嘉靖四十年（1561），但家貧無力刊刻。後由「爾祝」即王堯封，²³先刊行《尚書日記》，此即于明照所謂「家塾業已刊布」。《書帷別記》則為「德威」所刊，其生平不詳，今可見《書帷別記》卷首下署王樵四子王啓疆、王肯堂、王干城、王岳陞及姪孫王秉鉞、王秉銓校刊。

王樵既著《尚書日記》，為何「旋著《書帷別記》」？主要與舉子需求、科舉時風有關，其〈書帷別記序〉謂：

舉業之陋，日甚一日，至有全不為義理而專為應舉之計者，章擬而為題，題擬而為意，其所謂意者，未必經傳之意也。甚則外取講學參禪之餘緒以為新意，致為知德知言者之所厭者久矣。然科舉既未可廢，則業舉之言雖陋，無亦且導之，即所業而求諸義理，即所得而正學以言乎。予先年《尚書》有《記》，意頗在此，乃學者猶謂其不近於舉業，欲予更約言之，則又為此編。誠能與《日記》相參攷而熟玩焉，於先聖之遺意，未必無所發明云。²⁴

²²（明）王肯堂：〈識語〉，收於（明）王樵：《尚書日記》（南京：南京圖書館藏萬曆王錫琛刊本），卷前，頁1。

²³王堯封，字爾祝，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員外郎中、南昌知府等，見（清）郭毓秀：《金壇縣志》，卷9〈選舉志〉，頁12。

²⁴（明）王樵：〈書帷別記序〉，《書帷別記》（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王啟疆等刊本），卷前，頁351-352。

此序署為「萬曆甲申六月」，可知刊行時間為萬曆十二年（1584），距王肯堂所言嘉靖四十年（1561）「旋著《書帷別記》」，已過二十三年。序中所謂「學者猶謂其不近於舉業」，「其」指《尚書日記》，即王堯封所刊「草本」，但也包括于明照所刊「定本」，因後者流傳較廣，讀者意見更增。王樵對讀者反應甚為在意，其為鍾庚陽（1540-1598）《尚書傳心錄》作序謂：

余家世業是經，少嘗受讀，粗得其文義，晚而味之，乃始有悟，時時為子弟說之，然其詞不能不多，遂不適用於觀者。今觀鍾先生《書說》，則約而該，瞻而覈，蓋舉業之正途，而明經之指南已。²⁵

鍾庚陽，字長卿，浙江嘉興人，當地亦治《尚書》知名，²⁶其傳承家學，於隆慶二年（1568）中進士，後出守鎮江，王肯堂及其侄王秉鉞曾師事之。金壇知縣劉美因「金壇之治《尚書》者，十戶而九不畜也」，²⁷故於萬曆九年（1581）刊刻《尚書傳心錄》以嘉惠舉子，特請王樵作序。王肯堂甫於萬曆七年（1579）中舉人，與王秉鉞參與校正，並為撰〈跋〉，²⁸可見王氏家族對地方士學的推動與回餽。

王樵在序中自言幼稟家學，晚年始悟，「時時為子弟說之」，此見教學相長，亦為家學傳承的重要法門。值得注意的是「然其詞不能不多，遂不適用於觀者」，雖未明言《尚書日記》，仍呈現說解繁複、不合讀者需求的實情。科舉是現實功業，舉子為功令而治經，要求科舉用書簡便易觀，自是無可厚非，王樵因而盛讚《尚書傳心錄》「約而該，瞻而覈」切合應舉之用，亦凸顯知縣的刊刻用心。當

²⁵ （明）王樵：〈鍾先生尚書傳心錄序〉，收於（明）鍾庚陽：《刻嘉禾鍾先生尚書傳心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明萬曆九年劉美刻後印本），卷前，頁2。

²⁶ 同前註，卷末，王肯堂：〈跋〉，頁182，「蓋大江而南以《尚書》明經起家者，莫盛于樵李云」。

²⁷ 同前註，頁182。此跋亦見（清）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90〈鍾氏庚陽尚書傳心錄〉，頁492，文字略有不同。

²⁸ 同前註，王肯堂：〈跋〉，頁183，署名「門下士王肯堂頓首拜謹跋」。卷5，頁143，署有「門人王秉鉞較正」。

然這不無客套的成分，但「約而該，瞻而覈」可見出其對科舉用書適用性的理解。

文末「舉業之正途」與「明經之指南」，亦透露其撰著理想。對照前引〈書帷別記序〉，所謂「舉業之陋」在於三方面：一為割裂章句，不為義理而專為考試服務。一為解說章句題意，未必為經傳之意。一為取講學參禪以為新意，已非程朱經說正統。王樵所指為當世科舉風氣及用書的良莠不齊，²⁹意在凸顯《書帷別記》與《尚書日記》都能「即所業而求諸義理，即所得而正學以言」，發明「先聖之遺意」，此乃知識份子應肩負的使命。此處揭櫫的高遠理想，即是舉業正途、明經指南之意，《書帷別記》是否達成理想？可以進一步觀察內容的規畫與撰寫。

三、內容規畫的要點

《尚書日記》不載經文，按照各篇章次第，彙集古今說解，並加入己見詮釋經義。如〈堯典〉有一〇七則說解，又附〈堯典附錄〉一則及〈土圭之法〉三則，³⁰內容甚為豐贍。其版式為：篇章名低二格，說解皆以○領起，頂格排列。整體而言，是書闡明經義，發揮個人學術意見，力求詳備，卻也不免繁冗。

王堯封所刊《尚書日記》今已未見，于明照所刊之本與《書帷別記》刊刻時間接近，可堪比對，而一為十六卷，一為四卷，可見刊削幅度甚大。但《書帷別記》並非《尚書日記》的刪節本，而是重新規畫體例，改以題目引領說解，又刪除罕見出題的篇章，使內容集中，以下說明規畫要點及用意：

（一）以題領說，凸顯辨題為先

應舉首重認題，《書帷別記》改採以題領說的形式，摘列各篇重點命題，如

²⁹ 萬曆時期科舉時風，可參考龔篤清：《明代八股文史探》（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章〈隆慶和萬曆：明代八古文的變革期〉，頁389-391。科舉用書的撰刊及內容概況，可參考前引陳恆嵩：《禹貢、經筵、科舉：宋明《尚書》學新探》，第7章〈明代科舉《尚書》學〉，頁223-308。及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

³⁰ （明）王樵：《尚書日記》，卷1〈堯典〉，頁1上-38上。

今日之「考古題」，以架構全書。各篇前附有總說，總說之下分列題目，以一題一說為原則，其後附以說解。其版式為：篇名低一格呈現，總說頂格排列，題目皆低二格，所附說解再以頂格排列。此為當世科舉用書常見版式，意在符合舉子閱讀習慣，以利臨考認題作答，亦凸顯應舉以辨題為先之意。書中摘列題目甚為多樣，各有用意：

1. 指出舊題，重點提示

《尚書》考題常反覆出現，《書帷別記》所列題目如為鄉試、會試舊題，會予重點提示，以便溫故知新。如〈益稷〉有題「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說解：「嘉靖戊子南畿出此題」，指出此為嘉靖七年（1528）南京鄉試的考題。同篇有題「念哉！率作興事止屢省乃成，欽哉」，說解：「甲午南畿程文做法甚整齊」，³¹指出有嘉靖十三年（1534）南京鄉試的程文可資取法。惟全書所列舊題，並未悉數註明，此乃科舉實行日久，命題反覆重出，無法全數著錄，故僅作重點提示，避免煩瑣。

2. 標示好題，分析題目份量

《書帷別記》提示命題方向，會標明好題，指導審視題目份量，衡量應答。如〈大禹謨〉有題「三旬，苗民逆命止有苗格」，說解：「自『益贊于禹』出起，至『來格』，最是一好題，不可不理會，敘事陳言皆有曲折，非可漫做者」。³²可見好題在於題意別有曲折，提高了考測難度，不可漫應漫作。類似提示又有〈益稷〉之題：「帝拜曰：俞！往欽哉」，說解謂：「此亦一好題」。³³至如〈無逸〉有題「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說解：「『抑畏』二字高『無逸』一層。此題重。將論文王之無逸，而先述其源流之深長意。」³⁴提醒此題深具份量，要追溯源流，才能導出文王之無逸。標舉好題、重題，凸顯臨文構思務必緊扣題旨，上下追溯引申，方能使文與題相得益彰。

³¹ （明）王樵：《書帷別記》，卷1〈益稷〉，頁379及381。

³² 同前註，卷1〈大禹謨〉，頁372。

³³ 同前註，卷1〈益稷〉，頁382。

³⁴ 同前註，卷4〈無逸〉，頁451。

3. 標示題目分合，指出命題趨向

鑑於同篇章考題多有分合變化，答題須隨之權變，故是書選列同段經文之命題，或長或短，或摘引或截斷，題型多樣，反覆示例。如〈禹貢〉「冀州」的一段經文：「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就列出「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載止岳陽」、「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既載止衡漳」、「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六題，皆予解說，並於說解「既載止衡漳」時予以歸納：「上三題言水治也，末一題言土平也」，³⁵「上三題」即「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載止岳陽」，「末一題」即「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點出諸題「水治」、「土平」題旨不同，必須精準作答。

同段經文中，若有不適合命題的文句，會予規避。如〈益稷〉經文：「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王樵於此段經文共列出七題，分別為「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止俞。往，欽哉」、「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念哉！率作興事止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帝拜曰『俞。往，欽哉』」。以上各題幾乎涵蓋全段經文，可見甚常出題，但獨不見以「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命題。³⁶侯美珍統計明代鄉、會試考題，指出〈益稷〉共出一〇四題，此段更常考，惟「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為負面形容，始終未曾出題。³⁷由此可見，王樵精於選題，符合當世科考趨向。

³⁵ (明)王樵：《書帷別記》，卷2上〈禹貢〉，頁383。

³⁶ 同前註，卷1〈益稷〉，頁381-382。

³⁷ 侯美珍：〈明代鄉會試《尚書》義出題考察：以考官出題偏重為主的討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7期（2015年9月），頁165-166。

4. 說明搭題，掌握寫作訣竅

《尚書》考題有所謂「搭題」，常以數節經文拼搭命題，增加寫作難度。《書帷別記》列出搭題，會標示經文起句、結句，使題目簡明呈現，再提示作法。如〈大禹謨〉有題：「自『克艱』至『永賴』七節」，即為搭了七節的「搭題」，說解謂：「脈絡指趣，《書記》備矣。凡搭題不問搭上搭下，在作者變化，茲不復詳及」。³⁸此處說解重點不在經義，而在寫作訣竅，點出詳熟經文脈絡指趣，是駕馭搭題的不二法門，提醒讀者領會。

搭題變化多端，是書會指示因應之道。如〈舜典〉有題「五載一巡守」，說解：「此題搭下節，要知上節攝位初事，下節治水後事，事不相蒙，開開看」。³⁹又如〈益稷〉有題「皋陶曰：兪！師汝昌言。禹曰：都止申命用休」，說解：「下節本更端不與上意相涉，但題如此出，則下面『安汝止，惟幾惟康』，是君心上工夫，尤保治之本。而『其弼直』則又得交脩之助，則所謂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于無窮者，孰過于此。此以義理為主意，而非鑿空于本文之外也」。⁴⁰隔節搭題須以辨題為先，題既如此出，就要咀嚼題意，如果上、下節文意無甚干涉，就試著「開」掘出一層意思來寫。

值得注意的是，《書帷別記》所列題目，不論單句題、數句題、搭題等，多為經文完整的「大題」，此與舉業正途的理念有關。因科舉行之有年，題目出盡，為增加考題變化和難度，出現不少特殊命題，以割裂、混搭經句，讓考生臨題困窘，難於下筆。這種題目的缺點，在於易走偏鋒，失去科舉傳承經說正統、代聖賢立言的本意，如李長庚（?-1644）謂：「近世主司非本經而反以搭題難士，溺其旨矣」。⁴¹然持平而論，此類命題能解決考題重複出現、易於猜題或背誦範文應考等問題，亦可測知考生對經文與義理的熟悉度，實有必要性，惟前提在於必須有

³⁸ (明)王樵：《書帷別記》，卷1〈大禹謨〉，頁367。按，此處原文作「指趣」。

³⁹ 同前註，卷1〈舜典〉，頁361。

⁴⁰ 同前註，卷1〈益稷〉，頁376-377。

⁴¹ 李長庚：〈春秋衡庫序〉，收於(明)馮夢龍：《春秋衡庫》(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天啟五年刊本)，卷前，頁11。

規範，如馮琦（1558-1603）即謂：「學術自有正路，文體自有定裁，如兩扇、兩截等題，俱有一定體格，不得一味凌駕，隨意割裂。」⁴²

王樵對過於割裂經文的命題，會予嚴厲批評，如說解〈益稷〉之題「其弼直止予違，汝弼」，謂：「出題者專取『弼』字相應，而節去上截，已為侮經，若作文者復不能發此大道理，而隨題轉合，不又重得罪于聖經乎」。⁴³ 考察「其弼直」經文為「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乃大禹所言，意即安於汝之本分，能把握機宜則能安定，輔佐者為有德之人，則天子有所舉動諸臣皆應之。⁴⁴ 考官命題時刪去「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三句，直接將「其弼直」與下節經文「予違，汝弼」連綴，即是「節去上截」，把經文義理截斷，舉子如果不熟經文，隨題轉合，就無法完整發明大禹意旨，故王樵指斥甚嚴。

5. 只列題目，避免說解過繁

《書帷別記》羅列題目不厭其詳，但顧及篇幅擴增，易使讀者目厭，故有只列題目而未附說解者。如〈大禹謨〉列出「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止養民○吁！戒哉止俾勿壞」，此處經文甚長，中間以○區隔，可分為二題，亦可隔節搭題。但此題未附說解，推究其因，乃前已列題「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說解二句要旨，後又有題「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其下說解由「德」字論及「九敘惟歌」、「俾勿壞」，⁴⁵ 實已涵蓋此段經文，故只載明出題變化，無須贅語。

類似形式甚多，如〈呂刑〉有題「惟良折獄止有德惟刑」，未附說解，原因亦在此題甚長，前已列出同段經文的五則命題，包括：「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止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

⁴² （明）馮琦：《宗伯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萬曆刻本），卷37〈為遵奉明旨開陳條例以維世教疏〉，頁6。

⁴³ （明）王樵：《書帷別記》，卷1〈益稷〉，頁378。

⁴⁴ 以上說解見屈萬里：〈臯陶謨〉，《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頁39。「其弼直」即「其弼德」。

⁴⁵ （明）王樵：《書帷別記》，卷1〈大禹謨〉，頁368。

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⁴⁶各題之下均有解析，故義理已詳，足以互參。

惟書中亦有少數列出題目而無說解，其原因不易推敲。如〈舜典〉列出「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⁴⁷所述爲堯帝之死，並不適於出題，此處只列出題目，未附說解，無法辨別選題用意，令人多生疑惑。又如〈多士〉有題「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未附說解，不知如何解讀「王曰。又曰」？⁴⁸又如〈無逸〉有題「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⁴⁹此爲全篇結語，未附說解之因，是否易認易寫？或是全篇說解足以互參？難以確知。

（二）衡量出題多寡，刪減篇章及命題

《尚書》經文共五十八篇，《尚書日記》側重解經，故悉依篇章次第說解，李維楨（1547-1626）謂：「惟金壇王中丞公《日記》裒錄百家訓故，於經旨多所發明，而亦可用於科舉之文」，⁵⁰可知時人重視是書對經旨的闡發，應舉則屬次要的功能。

《書帷別記》則以應舉爲主要功能，故常出題與罕見出題的篇章，題目選列數量有所不同，甚至影響全書架構與內容份量，以下統計各篇列題數量：

⁴⁶ （明）王樵：《書帷別記》，卷4〈呂刑〉，頁486-487。

⁴⁷ 同前註，卷1〈舜典〉，頁362。

⁴⁸ 同前註，卷4〈多士〉，頁450。按，（清）江聲：《尚書集注音疏》謂「王曰下蓋有脫文。」見屈萬里：《尚書集釋》，頁196。

⁴⁹ 同前註，卷4〈無逸〉，頁452。

⁵⁰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三十九年刊本），卷7〈尚書日記序〉，頁440。

虞書	堯典 30	舜典 68	大禹謨 56	皋陶謨 31	益稷 47
夏書	禹貢 88	甘誓 1	五子之歌 6	胤征 5	
商書	湯誓 0	仲虺之誥 18	湯誥 8	伊訓 21	太甲上 7
	太甲中 7	太甲下 9	咸有一德 14	盤庚上 4	盤庚中 2
	盤庚下 2	說命上 10	說命中 11	說命下 5	高宗彤日 (刪)
	西伯戡黎 (刪)	微子 (刪)			
周書	泰誓上 4	泰誓中 3	泰誓下 4	牧誓 0	武成 3
	洪範 48	旅獒 14	金縢 0	大誥 11	微子之命 12
	康誥 39	酒誥 22	梓材 10	召誥 25	洛誥 22
	多士 9	無逸 13	君奭 37	蔡仲之命 10	多方 9
	立政 41	周官 31	君陳 23	顧命 20	康王之誥 8
	畢命 27	君牙 15	冏命 15	呂刑 59	文侯之命 9
	費誓 5	秦誓 8			

由上表可見，《書帷別記》命題數量最多者為〈禹貢〉，其次為〈舜典〉、〈呂刑〉、〈大禹謨〉、〈洪範〉等篇，此即常見出題篇章。而罕見出題篇章則予刊削，其作法有三：一為直接刪除篇章，如〈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及〈微子〉，導致是書僅錄《尚書》五十五篇。一為不列題目，如〈湯誓〉、〈牧誓〉、〈金縢〉僅有總說，未列題目。一為少列題目，如〈甘誓〉只列一題。

侯美珍統計明代鄉會試《尚書》義出題，題數最多者為〈洪範〉、〈大禹謨〉，次為〈舜典〉、〈皋陶謨〉、〈益稷〉、〈禹貢〉等篇。相對的，〈甘誓〉、〈湯誓〉、〈盤庚中〉、〈盤庚下〉、〈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金縢〉，因多涉及暴政、喪亂，或多撻伐、怨怒情緒，故而罕見出題。⁵¹對照之下，《書帷別記》所列各篇命題數量多寡，幾乎與之吻合。

因為罕見出題就把篇章刪除，或不列題目、少列題目，是否為便利應舉而妥

⁵¹ 見侯美珍：〈明代鄉會試《尚書》義出題考察：以考官出題偏重為主的討論〉，頁 152-153 及 157。

協？或引導舉子投機心理？其實此種撰著現象元末已有，如王允稔（元統二年1334進士）《書義矜式》、陳雅言（1318-1385）《書義卓躍》，學界已有注意，⁵²故為貼近科舉而刪減篇章或命題，並非王樵獨創。

除了刪除罕見出題篇章，〈湯誓〉、〈牧誓〉、〈金縢〉只附總說，且筆法隨興，內容繁簡不一。如〈湯誓〉總說只有一句：「以金仁山『不可不順天、不可不救民』二意立看」，⁵³指示遵照金履祥《資治通鑑前編》之說，點到即止，好似聊備一格。

〈牧誓〉之總說，先予解題「此篇在商郊牧野臨戰之誓也，《書記》備矣」，後則指導閱讀，謂：「此篇與〈甘誓〉備見古人用兵之節制，陳法戰法數言而盡其曲折，明如圖畫，此聖經之妙也。」⁵⁴此處指示將〈牧誓〉與〈甘誓〉同看，與王樵個人興趣才具有關，其深研律法，著有《讀律私箋》，又善於用兵，曾有帶兵擊沉倭艦之戰績，⁵⁵故對〈牧誓〉〈甘誓〉甚為推崇。惟〈牧誓〉、〈甘誓〉雖言軍紀，卻涉及威嚇刑戮、討伐暴政，故而罕見命題，是以王樵仍就應舉考量，於〈牧誓〉只有總說，未列題目，而在〈甘誓〉亦只列一題：「左不攻于左止汝不恭命」，未多費篇幅。

〈金縢〉記錄周武王過世後，因管叔、蔡叔的流言，周成王對周公產生懷疑，其後啓開金縢之匱，見其中所藏冊文，方知其忠貞。此篇牽涉明成祖朝代繼承的合法性，故罕見出題，學者艾爾曼已有論述。⁵⁶王樵於此篇未列題目，篇前總說亦

⁵² 如鄭翠蘭：《王允稔《尚書》學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4年），論及《書義矜式》對於罕見出題篇章，只存篇名、未摘錄語句為文的現象。侯美珍：〈明代鄉會試《尚書》義出題考察：以考官出題偏重為主的討論〉，頁160，論述《書義卓躍》亦有類似撰著方式，並分析其原因。

⁵³ （明）王樵：《書帷別記》，卷2下〈湯誓〉，頁398。按，所引之語見（元）金履祥：《資治通鑑前編》（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宜興路氏刊本），卷4，頁3下。

⁵⁴ 同前註，卷3〈牧誓〉，頁417。

⁵⁵ 王樵深研律法，可參見邱澎生：〈有資世用或福祚子孫：晚明有關法律知識的兩種價值觀〉。王樵擅於帶兵，萬曆元年（1573）任浙江僉事，曾帶兵反擊倭寇，擊沉倭艦四艘，見孟濟元主編：《金壇縣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篇〈王樵〉，頁782。

⁵⁶ （美）艾爾曼著，張琰譯：〈明代政治與經學：周公輔成王〉，《經學·科舉·文化史：艾爾曼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39。

未碰觸叔侄權位爭奪問題，僅摘引經文說解，如：「『自以為功』之說，《書記》好。」「『茲攸俟，能念予一人』，《書記》好○其餘《書記》詳矣，宜精玩之。」⁵⁷要求舉子參見《尚書日記》的說解，以便領略義理，此即〈書帷別記序〉所說「與《日記》相參攷而熟玩焉」。

四、義理說解的要點

《書帷別記》側重應舉，在義理說解上有何表現？以下分就遵從《蔡傳》、標示互見、加入新解、章句訓詁、玩經閱史五端討論：

（一）遵從《蔡傳》，指示應考周旋

王樵在《尚書日記》卷前〈書例〉自言撰著命意：一在羽翼蔡沈（1167-1230）《書集傳》，補以朱熹（1130-1200）之說，以詮釋經旨。一在采輯稱引馬融（79-166）、鄭玄（127-200）、王肅（195-256）、孔穎達（574-648）諸說，或定從一家，或兼存舊說，以補益制度和事蹟。一在分辨舊說之訛，解析傳記異辭之不無害教者。⁵⁸故是書會通古義時義，加以辨析，頗有「集註」、「集釋」的意味。

《書帷別記》以指導應舉為目的，故強調守經遵註，以蔡沈《書集傳》為依歸。如〈康誥〉有題「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說解：「蔡氏謂此二句為一篇之綱領，而于下文段落血脈歷提得甚分曉，見通篇只是一片話，此《蔡傳》之精采處也」。其下有題「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說解：「《蔡傳》云：以保子之心保善，保善二字須要活看，蓋對去惡而言，凡情有可恕而恕之者，皆為保善耳」。⁵⁹指示應舉為文須以《蔡傳》為綱領，即可符合科考需求、考官評選，節省構思心力。

⁵⁷（明）王樵：《書帷別記》，卷3〈金縢〉，頁429。

⁵⁸（明）王樵：《尚書日記》，卷前〈書例〉，頁1上-2上。

⁵⁹（明）王樵：《書帷別記》，卷3〈康誥〉，頁433及436。

若是經文難曉，《蔡傳》說解未詳，是書會予迴避，不作考辨。如〈無逸〉「不義惟王」意旨不明，《尚書日記》謂：「其語難解，其事難攷，不如闕之」，⁶⁰《書帷別記》列題「其在祖甲止三十有三年」，即未說解「不義惟王」。⁶¹又如同篇「惠鮮」一詞，《尚書日記》予以考辨：「惠鮮字難曉。《蔡傳》謂賚予調給之，使之有生意。蓋以意解，比舊說為有理，但欠證據。《史記》陸賈云『數見不鮮』，言人情頻見則易厭，不見鮮美也。《後漢·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此可證『惠鮮』之義。又韓愈詩云『霜曉菊鮮鮮』」。⁶²此則說解援引史傳文獻及韓愈（768-824）詩歌，補益《蔡傳》，辨明「惠鮮」之疑惑，可見王樵說經會通經史，還兼及文學。⁶³《書帷別記》列題「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止五十年」，不考辨題中「惠鮮」之義，直接云：「《書記》備矣」，⁶⁴請讀者自行參見。對於經文的相關存疑與考辨，乃審慎治經的態度，但卻是平日的工夫，備考時不須涉及，因為字意確鑿，方有利記誦。

若《蔡傳》說解未當，是書會指導因應。如〈洛誥〉「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說解：「《書記》妙甚，但說『頒』字與《蔡傳》異，業舉者且只得依《蔡傳》」。⁶⁵考察《尚書日記》對「頒」字的說解：「《說文》頒，分也，周公嘗不暇于先，今成王親而繼行之，是分其所不暇也」，並強調：「『頒』字依《說文》之訓為是，若作為已頒布所不暇，則非告君之體，且字亦欠雅」。⁶⁶王樵評說有據，可見治經自信，但《書帷別記》輔導應舉，仍指示依循《蔡傳》。

若認為《蔡傳》有誤，亦指示遵循。如〈舜典〉有題「五玉、三帛、二生、

⁶⁰ (明)王樵：《尚書日記》，卷12〈無逸〉，頁25下。

⁶¹ (明)王樵：《書帷別記》，卷4〈無逸〉，頁451。

⁶² (明)王樵：《尚書日記》，卷12〈無逸〉，頁27上-27下。

⁶³ 王樵對詩歌頗有心得，反對用事求工、模擬前人，見《方麓集》，卷16〈戊申筆記〉，頁459。

⁶⁴ (明)王樵：《書帷別記》，卷4〈無逸〉，頁451。

⁶⁵ 同前註，卷3〈洛誥〉，頁446。按，經文應為「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此題脫一「聽」字。

⁶⁶ 二說見(明)王樵：《尚書日記》，卷12〈洛誥〉，頁8上-頁8下。按，是書著錄經文亦作「乃惟孺子頒，朕不暇」。

一死贄」，說解：「五玉，《蔡傳》誤以為五瑞，須替他周旋」，⁶⁷指出《蔡傳》之誤，但未說明理由。考察《尚書日記》說明「五玉」：「按《周禮》〈小行人〉注，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諸侯相享之玉，各降其瑞一等。則瑞自是瑞，玉自是玉，《傳》《疏》相承，以五玉即五瑞，誤也」。⁶⁸再查是書說解「輯五瑞」，「瑞」指符信，乃五等諸侯所執五種符信：「五瑞者，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⁶⁹王樵對《蔡傳》及孔穎達《疏》的指正，可見詮解字句的一絲不苟，然「須替他周旋」之語不帶苛責，蓋古代諸侯皆以玉作為符信，玉與瑞仍有一致性。⁷⁰

又如〈禹貢〉「西傾因桓是來止亂于河」，說解：「《蔡傳》明白，但有誤字。《書記》考正備矣，宜細觀之」。⁷¹考察《尚書日記》，其失誤處在於說解經文「逾于沔」：「由陸而南歷罍穴，而迤邐以接漢沔」，將「罍穴」誤作「岡北」，故謂：「罍，山名，有大穴，作岡北者誤」。⁷²可見《尚書日記》指正《蔡傳》，皆言明理由，治經嚴謹有據，而《書帷別記》僅提示「有誤字」，須待二書並觀互見，方知原委。

（二）標示互見，引導熟玩經義

前文提到《書帷別記》透過與《尚書日記》互見，補充義理闡釋，引導延伸閱讀，其實是書「互見」尚有其他變化，以下加以討論：

一為引導互見《尚書日記》，語句至為精簡。如〈康誥〉有題「『非汝封刑人殺人』一節」，說解僅三字：「《書記》好」。⁷³〈大誥〉有題「予永念曰：天

⁶⁷（明）王樵：《書帷別記》，卷1〈舜典〉，頁360。

⁶⁸（明）王樵：《尚書日記》，卷1〈舜典〉，頁11下。

⁶⁹同前註，卷1〈舜典〉，頁8下及9上。

⁷⁰如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頁148，「五玉」：「古代諸侯作符信用的五種玉」。同書，頁162，「五瑞」：「古代諸侯作符信用的五種玉。」屈萬里：〈堯典〉，《尚書集釋》，頁21，亦謂：「五玉，即五瑞」。

⁷¹（明）王樵：《書帷別記》，卷2上〈禹貢〉，頁390。

⁷²（明）王樵：《尚書日記》，卷5〈禹貢〉，頁51上。

⁷³（明）王樵：《書帷別記》，卷3〈康誥〉，頁436。

惟喪般，若樞夫止惟休于前寧人」，說解僅四字：「《書記》甚妙」。⁷⁴〈洛誥〉有題「『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三節」，說解：「《書記》已盡」。⁷⁵又如〈說命中〉「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三題同列一則，看似題義甚繁，說解只有三字：「《書記》好」。⁷⁶此類簡單勾串甚多，隨興口語的表達，寄寓著強制性，不允許投機取捷，舉子若不查閱照看，則上述諸題形同毫無說解。

一為與前賢之說互見。如〈周官〉有題「『冢宰掌邦治』六節」，說解：「《書記》精且詳矣。六官次序之義，呂氏說好」，⁷⁷指示參閱《尚書日記》及呂祖謙（1137-1181）《增修東萊書說》。又如〈秦誓〉有題「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說解：「羅文莊公曰：〈秦誓〉一篇可為後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引述羅欽順（1465-1547）《困知記》之說。⁷⁸王樵根據題目所需，或點出名家，或勾勒論點，目的在引導舉子拓展眼界、深植學力，此為其治經一貫法則，《尚書日記》即調和各家說解，兼納古義時義，以顯明經旨。總括來看，多方互見可節省篇幅，引導舉子深究經義，卻也使得是書不易獨立完足，影響讀者誦讀記憶的便捷與全面性，王樵知曉利弊，捨去便捷而採取互見，別有深意。

除參閱前人之說，是書批評時講，可謂另種互見。如〈堯典〉有題「若時登庸」，說解：「時講以『若時』為輔相，又以命曆官為急先務，此下為急親賢，皆陋說不可用」。⁷⁹又如〈臯陶謨〉有題「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

⁷⁴ （明）王樵：《書惟別記》，卷3〈大誥〉，頁430。

⁷⁵ 同前註，卷3〈洛誥〉，頁446。

⁷⁶ 同前註，卷2下〈說命三篇〉，頁412。

⁷⁷ 同前註，卷4〈周官〉，頁465。按，其說見（宋）呂祖謙：《增修東萊書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卷30，頁416。

⁷⁸ 同前註，卷4〈秦誓〉，頁491。按，其說見（明）羅欽順：《困知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續卷下，頁12下-13上。

⁷⁹ 同前註，卷1〈堯典〉，頁357。

載采采」，說解：「時講把『見于行』與『載采采』作一層攪說，謬之謬也」。⁸⁰以上「時講」均未註明出處，應為流行之見，指引舉子明辨。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明代科舉用書常見批評「時講」，卻未註明批評對象，意在行銷己說、顯示權威感，王樵對「時講」的批評，其實也是類似作法。

又有標示己文，引導參閱互見。如〈說命下〉有題「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止其永無愆」，說解：「此題吾有文佳甚」。另一題「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止天子之休命」，說解：「此言之意，吾丙午鄉試文佳」。⁸¹又如〈呂刑〉有題「德威惟畏止率乂于民棊彝」，說解：「吾有文甚好」。⁸²王樵對己作深具自信，科名有成亦增說服力，但僅略為一提，並未提供全文，乃因篇幅體例之限，又有程文墨卷可參。此外，當世有記誦他人之文以僥倖應式者，顧炎武（1613-1682）謂：「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⁸³是書不提供全篇範文，亦有避免「捷得」之意。

（三）加入新解，會通經義

《書帷別記》在《尚書日記》之外，常加入新的心得見解。如《尚書日記》說解〈堯典〉「放勳」有謂：「自洪荒以來，羲、農、黃帝數聖人作，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為尤大，故曰放勳。蓋自古極治之盛，莫過於堯。前乎此者，有未至；後乎此者，莫能加」，又謂：「天地之經緯，庶事之條理，燦然于吾心，此聖人德性之文也」，⁸⁴皆明晰有力。

《書帷別記》列有「放勳」一題，說解甚詳：「『放勳』用真西山之意發揮纔親切。君天下者非一人矣，其功之大而無所不至，則惟堯而已。前乎洪荒之俗，

⁸⁰（明）王樵：《書帷別記》，卷1〈臯陶謨〉，頁374。

⁸¹同前註，卷2下〈說命三篇〉，頁413-414。

⁸²同前註，卷4〈呂刑〉，頁482。

⁸³（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卷16〈三場〉，頁385。

⁸⁴二則分見（明）王樵：《尚書日記》，卷1，頁2下及頁3下。

於此文明也；後乎風動之休，於此開先也。前有作者或未備，後有作者莫能加。○『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古人言德業與後世不同，蘊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一物而已。『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本字下得好。『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古人言德必及行，德性行實皆『放勳』之所本也。德性行實作四個字看，或言德出於性，行出於實，非是。『光被』二字連，或欲於『光』字一斷，亦未是。有是盛德則有是光輝，發于事業，以至被于四表，格于上下，此『放勳』之所極也。極者，言其所及到此也。○德性行實之美，總是贊其德之盛，『光被』二句，總是贊其所及之遠，但『被』以流行言，『格』以充塞言，『四表』橫說，『上下』豎說。」⁶⁵

以上所錄為全文，中間以○區隔各說。王樵指示參見真德秀（1178-1235）之說，發揮為文。次則總說「放勳」題意，帶出古人所言德業的內涵，並說明以德性行實四端為文詮釋。復又聯結後文，析論德性行實之美。此段說解較之《尚書日記》愈增，乃王樵治經之新見，且「放勳」為二字句短題，必須會通全節經義，照會古今，故不厭其詳。

要考知《書帷別記》所增之新見，除細加比對《尚書日記》之外，亦可依循家學傳承的軌跡，由王肯堂《尚書要旨》窺豹一斑。《尚書要旨》乃王肯堂在翰林院任職時撰作，提供應舉參考。⁶⁶內容按經文章節順序，選列古今諸說，包括其父所著《尚書日記》及《書帷別記》，並以「書記」及「別記」區分註明。如說解〈堯典〉「曰若稽古帝堯 格于上下」，是書首列「真西山曰……」，次則為「別記云：古人言德業與後世不同……」，即前引《書帷別記》對「放勳」的說解全文。接著是「書記云：天地之經緯，庶事之錯綜……」，⁶⁷即《尚書日記》對

⁶⁵ (明)王樵：《書帷別記》，卷1〈堯典〉，頁352。

⁶⁶ (清)嵇璜：《欽定續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卷147〈經籍考〉，頁72，引張雲章謂：「《要旨》一書，肯堂官詞館所撰，蓋原本家學，而為學士家說經訓詁之用者也」。(清)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卷14〈書類存目二·尚書要旨〉，頁312，云：「是書承樵所著《尚書別記》，鈔撮緒言，敷衍其說，以備時文之用」。

⁶⁷ (明)王肯堂：《尚書要旨》（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

「放勳」的闡說。值得注意的，《尚書要旨》多數章節均引錄「書記」、「別記」之說，二者皆判然分別，由此可知《書帷別記》說解經義多有新見，足與《尚書日記》並觀，是書不僅為應舉服務，亦是王樵治經另一里程碑。

（四）章句訓詁，解題立論

《書帷別記》重視義理解析，故於章句訓詁，不嫌枝節煩瑣，指導拆解題面、布置論點。如〈立政〉有題「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說解：「兩『后』字是眼，一起一應，三個『宅』字內見，皆得人以居其職。得人指九德也，亦兼任之專意。夫君道莫大于用人，此三者不失所付託，則天工無曠，可以為君者，此也」。⁸⁸辨識文眼和篇旨，即可破題為文。

文句的訓詁判讀，要開合靈活，注意一串意。如〈君牙〉有題「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說解：「二句一串意」。⁸⁹又如〈大禹謨〉「惟德動天，無往弗屆」，說解：「天為至遠而德可動，是德之所感無遠弗屆也，二句只是一句意，不可開了」。⁹⁰指示二句一起詮解，不可析分為二意。

又有重覆用字、命意的歸納整理。如〈大禹謨〉有題「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說解：「《書》中惟字有數義，有惟獨之惟，『惟服食器用』之類是也。有思惟之惟，『惟其始』之類是也。……」。⁹¹此處綜論「惟」字的用法及意義，再分析此題「惟修」、「惟和」、「惟敘」、「惟歌」，與上句「德惟善政」，以為五個「惟」字不應有二義，指導掌握關鍵字，揣摩破題要領。

面對長題，須予分段拆解。如〈呂刑〉「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止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說解：「此題當依《傳》，以擇人、盡心、備辭作三段立看。但擇

印明刊本），卷1〈堯典〉，頁495。按，引文「庶事之錯綜」，《尚書日記》原作「庶事之條理」。

⁸⁸（明）王樵：《書帷別記》，卷4〈立政〉，頁459。

⁸⁹同前註，卷4〈君牙〉，頁479。

⁹⁰同前註，卷1〈大禹謨〉，頁372。

⁹¹同前註，卷1〈大禹謨〉，頁369。

人當作一頭，中間盡心一段，『察辭』三句是問鞫時事，『明啓』四句是擬罪時事，『獄成』二句是結絕時事，以此立柱立眼，然後將末二句作一尾，則章法無差，《傳》意不失」。⁹²指示此題當採依傳行文之法，依照《蔡傳》之說，將題目拆解佈置為文，就可章法、《傳》意兩全。

對於易混淆文句，須小心辨別。如〈蔡仲之命〉「慎厥初，惟厥終」，說解：「此與〈仲虺之誥〉篇末語相似。彼言謹其終之道，惟于其始圖之。此言謹其初之道，惟在于其思其終。」⁹³又如〈多方〉「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止則無我怨」，說解：「『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與〈洛誥〉語相似，易混要記」。⁹⁴對照〈仲虺之誥〉篇末語為「慎厥終，惟其始」，〈洛誥〉語為「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可見王樵所言不虛，指導教誨甚為細膩。

對於難讀難記篇章，示以歌訣。如〈禹貢〉有題「厥貢惟土五色 止玄、織、縞」，說解引三字歌訣：「赤黑幣，是為玄。玄之用，袞端冠。祭以袞，齋以端。冠以居，曰玄冠。織與縞，皆繒名。織白緯，而黑經。縞純白，以養老。祥禫服，用織縞。」⁹⁵其後又潤改〈九州山水歌〉、〈貢物歌〉等舊有歌訣，提供記誦。〈禹貢〉素來難於備考，王樵借助歌訣，可見權變，惟仍加註識語：「〈禹貢〉歌訣舊有之，而詞句鄙俚，殊不堪讀，今稍潤色之，少為童蒙記誦之助。然學當熟玩經傳，則首尾自然貫通，教之歌訣，豈得已哉，學者慎之」。⁹⁶

（五）玩經閱史，會通古今事

王樵標舉「學當熟玩經傳」，可與前文所引〈金縢〉總說「宜精玩之」，及〈書帷別記序〉「與《日記》相參攷而熟玩焉」合觀。「玩」是玩味，指多方涵泳體察經文的深意，顯示在王樵心中，治經別有悠遊快意之境界，若純為功令而

⁹² （明）王樵：《書帷別記》，卷4〈呂刑〉，頁486。

⁹³ 同前註，卷4〈蔡仲之命〉，頁457。

⁹⁴ 同前註，卷4〈多方〉，頁459。

⁹⁵ 同前註，卷2上〈禹貢〉，頁386。

⁹⁶ 同前註，卷2上〈禹貢〉，頁391。

讀經，不免難於企及，更重要的是熟玩經傳可以爛熟本經，會通古事今事，有助於代古人立言，「令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⁹⁷寫出符合考官期待的文章，為應舉勝出之道。

王樵由熟玩經傳，拈出玩經與閱史之法，取效古書之體。如〈堯典〉有題「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說解：「古經文字真不可及，舜之履歷只數字間，盡其曲折。是鰥夫，是瞽子，父母兄弟，各以一字見其所處之難，克諧以孝，又以一字盡其善處之道，妙不容言，語簡意詳。在他人不費辭不能達意，縱有奇古亦不脫史家風，無此典重也，此玩經與閱史之法」。⁹⁸指引領略古文奇古典重、語簡意賅，增進為文境界。

又如〈周官〉有題「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說解：「宋神宗非不果斷，然志在取幽薊，勤在致富強，則志與勤皆用非所用，而又果以行之，是乃妄動，豈果斷之謂哉。如孔明以恢復漢室為志，治國練兵，是其勤，出師伐魏皆當幾，是其果斷。惜天不假之年，其功不成耳。老杜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千載之下，知之者一人而已」。⁹⁹雖受限篇幅，仍聯繫史實以說解遠古經說，使義蘊顯明。方苞（1668-1749）總論明代制義，謂：「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為明文之極盛」，¹⁰⁰王樵未標舉「以古文為時文」，然所言玩經閱史，與「融液經史」意近，用以申明義理、取效寫作，對於當世應舉風氣有所裨贊。

五、與《尚書日記》的合流

《書帷別記》初版之後未再續刊，而是與《尚書日記》整合為一。此本由蔡立身出資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刊刻，仍以《尚書日記》命名，卷數維持十六

⁹⁷ （明）王樵：《方麓集》，卷15〈戊申筆記〉，頁449。

⁹⁸ （明）王樵：《書帷別記》，卷1〈堯典〉，頁357。

⁹⁹ 同前註，卷4〈周官〉，頁466-467。

¹⁰⁰ （清）方苞撰，王同舟校注：〈原書凡例〉，《欽定四書文》（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

卷，內容恢復依篇章次第說解，不復以題引說。卷末附有彭燧〈尚書日記跋〉謂：

方麓王先生蚤歲懸車，著述甚富，其《尚書日記》、《書帷別記》二書，尤稱專門，為士林膾炙。顧版藏家塾，購者稱艱，即偶得一編，仍以未繇合璧為恨。茲再召為南少司寇，譽望聿隆，明允餘閒，輒加訂合。……合併之功，先生手筆十七，其三則先生從子我師華岡先生，稟而成之。¹⁰¹

可知二書之合併，亦出於讀者反應「未繇合璧為恨」，王樵在「南少司寇」即萬曆二十一年（1593）南京刑部右侍郎任內，親自訂合。「華岡先生」即王堯封，此時再次參與合併刊刻，王樵曾多次致書討論，如：

刻書唯寫時合細閱細改，若既上板，則跋涉太多矣。〈壺口〉一段不動亦可，但凡各處要改湊處，須付我看詳，隨文盈縮，自能別出新意，不必拘定舊《日記》、新《別記》之湊合也。況合併之名，似亦不雅。青陽君既捐貲列名，決當有一言以弁諸首。¹⁰²

可見王樵熟知版刻流程，「隨文盈縮」顯出思緒靈活，而書名不凸顯合併，亦有考量。其後，另封給王肯堂家書也可注意：

《書帷別記》已併入《尚書日記》中，似乎存剩舉業之言，亦不宜棄擲，故欲取汝稿補足成之。寄來《虞書》一本收訖，即草定付書坊矣。《四書》亦欲照此例而成一書。緣書坊見《紹聞編》士大夫多喜之者，新刻《書記》又盛行，故競來求此二書，并批點程文墨卷。書坊固但知覓利，而我之意，

¹⁰¹ 彭燧〈尚書日記跋〉，收於（明）王樵：《尚書日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二十三年蔡立身校刊本配補抄本），卷末，頁48。

¹⁰² （明）王樵：《方麓集》，卷9〈與再從子堯封書三十七則〉，頁282。按，「青陽君」即蔡立身，為萬曆元年（1573）解元。

則雖舉業，亦欲示人以正途也。¹⁰³

此封家書透露訊息包括：其一，《書帷別記》併入《尚書日記》的修訂中，尚有一些「舉業之言」未曾併入，亦不宜輕棄，擬取王肯堂書稿補成之。其二，新版《尚書日記》及《四書紹聞編》受歡迎，書坊競求二書及程文墨卷的批點。其三，坊刻趨於「覓利」，已作則欲示人正途。

王樵親手將《書帷別記》併入《尚書日記》，不再單獨刊行，可見對經學的側重，回歸治經說經的經學本旨。但舉業未被忽視，所言「欲取汝稿補足成之」，即王肯堂《尚書要旨》，欲整併父子應舉心得，此乃家學所繫，亦是對舉子的回餽，他尚有程文墨卷的批點，可謂多方面撰著科舉用書，提供應舉輔導。

值得推敲的是，王樵不諱言已作貼近舉業，而強調「欲示人以正途」，此因當日科舉用書常被視為「覓利」，導致眾所諱言，即使是蔡立身為新刊《尚書日記》作序，提到《書帷別記》時，猶謂：「是書初成再刻，里塾學者猶謂于貼括未近，請先生為《別記》一編。顧《別記》亦非貼括疇也，即貼括果于經義有一乎？」¹⁰⁴王樵對撰著科舉用書的看法，除前文引述〈鍾先生尚書傳心錄序〉「舉業之正途」與「明經之指南」的發言，亦可注意〈戊申筆記〉的一則評論：

蔡虛齋人物自高，然《蒙引》只是舉業之學，前輩篤實，此亦可見，在今人必諱舉業而高遠其言矣。¹⁰⁵

「蔡虛齋」即蔡清（1453-1508），成化二十年（1484）進士，其極力擁護舉業，以為「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第士之所以自求於經者，淺也。蓋不務實造於理，而徒務取給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舉子業之關於世道

¹⁰³ （明）王樵：《方麓集》，卷9〈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頁313。

¹⁰⁴ 蔡立身：〈尚書日記序〉，收於（明）王樵：《尚書日記》（南京：南京圖書館藏萬曆二十三年蔡立身刊本），卷前。按，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萬曆二十三年蔡立身刊本配補抄本卷前未有此序。

¹⁰⁵ （明）王樵：《方麓集》，卷16〈戊申筆記〉，頁461。

也有如此」，¹⁰⁶所著《易經蒙引》、《四書蒙引》即以匡正舉業與世道為己任。王樵以「篤實」、「人物自高」稱許蔡清的學問與人品，反映出「舉業之學」值得一流知識份子投入，《書帷別記》的撰著可以由此理解，乃王樵意欲維護科舉世界秩序、端正世道人心的實踐。

六、結論

明代科舉興盛，吸引無數舉子投入，《書帷別記》是順應而生的產物，可以由許多角度探討，惟限於篇幅，本文著重討論內容要點與撰著意義，以下由三端總結：

其一，由個人、家族到地方士學的傳承。《書帷別記》的撰著，來自王樵稟承家學，得第早發，其持續治經，在《尚書日記》的基礎上，別出應舉之指南，可視為科名有成者的回餽，也是知識份子的使命。而是書的刊刻，由家族合力完成，可見業舉家族延續家學的努力，亦善盡推動地方士學的責任，此為明代科舉制度不斷傳承、維護的動能。

其二，《尚書》的應舉教誨。《書帷別記》的讀者包括家族、鄉人與廣大學子，是書順應所需，以題領說，回顧舊題，亦對未來命題評估與預測，展示出《尚書》命題概況。全書側重認題寫作、義理闡釋和章句訓詁，隨興式的說明，猶如為子弟說經一般，並未建立更嚴謹的應考知識體系。惟仍出以權威的發言，透過大量互見，指示參閱《尚書日記》，引導深究義理，不允許投機取捷，又批評命題及時講之非，標榜舉業正途。但過多的互見，亦使是書難以獨立完足，讀者「未繇合璧為恨」，成為併入《尚書日記》的原因之一。

其三，治經與應舉的抉擇。《書帷別記》在《尚書日記》之外，多有新見，使是書成為治經另一里程碑。然為便利應考，要求舉子遵從《蔡傳》，又刪除罕見命題的篇章，略去題目與說解，透露出治經與應舉的兩難。以治經而言，藉由

¹⁰⁶ (明)蔡清：《蔡文莊公集》(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乾隆七年遜敏齋刊本)，卷3〈題蒙引初藁序〉，頁671。

科舉有助熟讀經書、發明先聖之言，但為應舉設想，只能提示守經遵註，義理字句之正訛，皆不可考辨妄改，故其欲藉是書指斥舉業之陋，實則難脫為考試而服務的窠臼，對晚明科舉流弊的興革仍是有限。

整體而言，是書預測題目、指導答題，協助舉子嫻熟經文與義理，寫出符合考官錄取標準的文章，所提供的《尚書》考題格式、答題技巧及說解方向的示範，可以見出明代萬曆時期《尚書》本經的科考概況。對於現代讀者而言，是書展示出一位經學家在追求現實功令時，猶不忘經學本質，意欲兼顧應舉與治經的用心，也呈現明代《尚書》學與科舉學的互動軌跡，記憶著那一段曾經盛極的科舉時光。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 呂祖謙：《增修東萊書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元) 金履祥：《資治通鑑前編》（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宜興路氏刊本）。
- (明) 王樵：《方麓居士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間刊崇禎乙亥補刊墓志銘本）。
- (明) 王樵：《尚書日記》（南京：南京圖書館藏萬曆二十三年蔡立身刊本）。
- (明) 王樵：《尚書日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二十三年蔡立身校刊本配補抄本）。
- (明) 王樵：《尚書日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十年金壇于明照刊本）。
- (明) 王樵：《尚書日記》（南京：南京圖書館藏萬曆王錫琛刊本）。
- (明) 王樵：《方麓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明) 王樵：《書帷別記》（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王啓疆等刊本）。
- (明) 蔡清：《蔡文莊公集》（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乾隆七年遜敏齋刊本）。
- (明) 羅欽順：《困知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

- 書》影印本)。
- (明)焦竑著，李劍雄點校：《澹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三十九年刊本）。
-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黃汝亨刻本）。
- (明)湯顯祖：《湯顯祖集》（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
- (明)王肯堂：《尚書要旨》（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刊本）。
- (明)馮琦：《宗伯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萬曆刻本）。
- (明)馮夢龍：《春秋衡庫》（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刊本）。
- (明)鍾庚陽：《刻嘉禾鍾先生尚書傳心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明萬曆九年劉美刻後印本）。
- (明)不著撰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登科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年，《明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影印本）。
- (清)孫汝謀等修：《鎮江府志》（東京：內閣文庫藏康熙十四年序刊本）。
- (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
- (清)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清)郭毓秀等修：《金壇縣志》（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康熙二十年序刊本）。
- (清)黃之雋等纂：《江南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清)方苞著，王同舟校注：《欽定四書文》（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
- (清)張廷玉等纂：《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 (清)嵇璜：《欽定續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 (清)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丁蓉：《明代南直隸舉人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

孟濟元主編：《金壇縣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

邱澎生：《當法律遇上經濟：明清中國的商業法律》（臺北：五南出版公司，2008年）。

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年）。

陳恆嵩：《禹貢、經筵、科舉：宋明《尚書》學新探》（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8年）。

劉起鈞：《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

龔篤清：《明代八股文史探》（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二) 期刊論文

王篤堃：〈科舉、家族與著述：明代南直隸金壇縣《尚書》專經研究〉，《教育與考試》第1期（2020年1月），頁35-41。

邱澎生：〈有資世用或福祚子孫：晚明有關法律知識的兩種價值觀〉，《清華學報》，第33卷第1期（2003年6月），頁1-43。

范金民：〈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布及特色分析〉，《南京大學學報》第2期（1997年2月），頁171-178。

侯美珍：〈明代鄉會試《尚書》義出題考察：以考官出題偏重為主的討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7期（2015年9月），頁137-172。

陳長文：〈明代科舉中的官年現象〉，《史學月刊》第11期（2006年11月），頁44-48。

陳時龍：〈明代科舉之地域專經：以江西安福縣的《春秋》經為例〉，《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5 本第 3 分（2014 年 9 月），頁 359-426。
連文萍：〈一甲不預，則望館選——王肯堂的科名與萬曆科舉世風〉，《成大中文學報》第 58 期（2017 年 9 月），頁 59-100。

（三）論文集論文

（美）艾爾曼著，張琰譯：〈明代政治與經學：周公輔成王〉，《經學·科舉·文化史：艾爾曼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22-48。

（日）鶴城久章著，鍾瑩譯：〈明代餘姚的禮記學與王守仁——關於陽明學成立的一個背景〉，《思想與文獻：日本學者宋明儒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56-367。

（四）學位論文

王篤堃：《王樵《尚書日記》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7 年）。

吳婷芳：《金壇于氏家族文化研究》（安慶：安慶師範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3 年）。

杭義梅：《王樵及其《方麓集》研究》（揚州：揚州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5 年）。

鄭翠蘭：《王允耘《尚書》學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4 年）。

Guideline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for

“*Shu Wei Bie Ji*” by Wang Chiao

Lien, Wen-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Wang Chiao was born in a learning family. He studied hard and succeed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s a Jinshi at his young age. “*Shang Shu Diary*” was his all-out efforts work of studying “*Shang Shu*”, however, its contents were numerous and jumbled for the candidates to prepar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o he wrote another book, “*Shu Wei Bie Ji*”, which collected the exam questions from “*Shang Shu*” and guided the candidates to identify the topics, explain the contents and interpret the words and sentences. But he didn’t establish a rigorous examination studying system, only explained casually. For the purpose of the examination, this book followed the instructions of “*Shu Ji Chuan*” by Tsai Chen and deleted the rarely proposition passages, and tried to carry forward the classics of the ancient sages and guided the etho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ut it’s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the stereotype of serving for examination.

Keywords: Wang Chiao, “*Shu Wei Bie Ji*” (Distinct Diary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hang Shu*” (Book of Document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